抗日战争歌曲集成

东北卷

● 王瑞璞／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祝抗戰歌曲選出版

歌声是情感的昇华
歌声是历史的回响

周巍峙題

二〇二一年夏

顾问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杨成武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副主任委员：吕正操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副主任委员：周巍峙　中国文联主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路明　中共黑龙江省委原顾问委员会主任
叶子龙　中共北京市原顾问委员会主任
叶连松　全国人大常委
冯培芝　国务院六机部原副部长
吕　骥　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主席
李银桥　毛泽东卫士长、公安部老干部局原副局长
肖　纯　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原副书记兼长春市委书记
宋双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指挥学院原政治委员
张　鲁　河北省文化厅原顾问
张志宏　天津宁园原主任（副部级）
张根生　吉林省人民政府原省长
陈培森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原政治委员
高　敏　中共北京市纪律委员会原副书记
郭　志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黎　明　中共河南省委顾问委员会原副主任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　莘
主　　任　聂瑞平
副 主 任　庄福祥
主　　编　王瑞璞
副 主 编　李　江　吕　英　谢忠厚　蔡盛春　乔树宗　牟雪冰
编委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门玉力　王　杰　王　茹（女）　王素田　王鸿烈
牛兰东　石玉昆　杨士畅　杨春明　李劲草（女）
张耀武　陈大荧　罗　华（女）　武　杰　娄记臣
赵忠义　谢丽丽

编　　务　王瑞璞　杨士畅　王素田　董增芳　刘　丹

《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序

这本《抗日战争歌曲集成》，是以王瑞璞为主编的几位同志，怀着极大热情，历经二十载的辛苦，搜集编选的。

王瑞璞同志是我几十年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他是一位老干部，曾在河北省冀中地区担任过七八个县的县委书记，作风淳朴，深入群众，富有实践经验，享有很高的群众威信。前几年从卫生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并没有做过文艺工作，但他却对抗战文化怀有很高的热情，尤其抗战歌曲，成为他毕生最挚爱、最热烈向往的艺术。我想这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他自幼生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在漫天的烽火中，从儿童团员起就唱那些抗战歌曲，可以说正是这些激越动人的歌曲，伴他成长和战斗的。回忆当年，晋察冀根据地抗战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出色。无论是歌咏、戏剧、诗歌、壁画、文学创作都很活跃。尤其是这些活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专业团体和群众的文化活动结合得很紧密。虽然战争是那样的残酷，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根据地从早到晚从来没有停止过抗战的歌声。这种景象，至今回忆起来仍是使人十分神往的。

可贵的是，瑞璞同志虽届晚年，革命的感情并没有中断。他仍想借这些抗战歌曲，来继续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因此，编选抗战歌曲就成为他离休后的一项热烈追求。当时根据地创作的这些抗战歌曲，内容丰富，数量很大，许多歌曲散佚民间，重新搜集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免得遗珠之憾，他和一

些同志不得不东奔西走，到处收罗，没有原稿就凭群众的记忆传唱重新录写下来。再经过精筛细选，几易寒暑，才使这本集成告成。这是他们流了很多汗水的结果，也是他们继续革命的热忱的结晶。因此，本书完成并将出版的时候，我很高兴为他们作序，以便代表千万读者向他们致以敬意和感谢。

魏　巍

2000 年 1 月 5 日

前　言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之际，我们经过20年的发掘、收集、筛选、整理、编辑的《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大力支持、关怀和具体帮助下，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了。这部洋溢着历史硝烟的歌曲集成，以特有的艺术形式，高昂的爱国主义旋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使人们不要忘记那个烽火连天、威武悲壮的年代。

这部由3000余首歌曲谱成的音符跳动的抗战史，既有久唱不衰的经典名曲，也有业余音乐爱好者和广大群众平时喜欢哼唱的民歌小调，还有抗日志士在牢狱里填词，刑场上演唱的歌曲（如：黄刚、陶玉珂烈士）。这些歌鲜明地铭刻着时代的烙印。它是血与火的记录，爱与恨的结晶。字行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韵辙间，激荡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呼声。这些歌曲，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穿越历史的烟云，飞掠岁月的长河，以其独特的爱国主义旋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读历史不忘民族耻辱，唱战歌激发爱国豪情。让我们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勇往直前。

（一）

这部书通过歌曲和背景资料结合的编辑方式，以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全面地展现了抗日战争那段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历史。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

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和协助东北一部分爱国军民组织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展开游击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与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改写了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历史，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要国家之一，对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巨大的牺牲，伤亡军民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伟大的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打了14年，时间之长，卷入群众之多，损失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战后的走向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走向世界之林的第一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人民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坚持持久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从全面抗战一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就及时提出了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全国人民不分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也无论中年、青年、老年和妇女儿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的历史洪流中去。伟大的抗日战争教育锻炼了伟大的人民，教育锻炼了伟大的党。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宣传教育组织和武装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建设了一支新型的强大的革命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了一个新型的真正的人民政权。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妇女真正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走向社会，参加到社

会实践中，参政议政，婚姻自主，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的现实使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应运而生的抗战歌曲真实生动地展示了这段历史的特殊风貌。在当时，旧中国文化落后加之战争环境、敌人的分割封锁、通讯联络的困难，使演唱抗战歌曲成了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悲愤、激昂、热情、奔放的抗战歌曲，像号角像战鼓唤醒和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在抗战第一线。

东北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下，出现了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新形势。同时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左翼文艺团体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揭开了抗战歌曲创作的序幕：率先投入创作活动的是韦翰章、陈洪、适群、黄自等人，于1932年先后推出的是《红旗飘飘》、《热血歌》、《把敌人赶出领土》、《战歌》、《冲锋号》、《上前线》，激怒地喊出了“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引导群众“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快一致持久抗战，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之后相继出现了聂耳、冼星海、吕骥、张曙、孙慎、周巍峙、贺绿汀、麦新、张寒晖等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喊出了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抒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豪情。例如：《松花江上》倾诉了东北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愤之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义勇军进行曲》、《华北抗战歌》以慷慨悲壮的旋律，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豪情和中华民族不怕牺牲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有力地反驳了蒋介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的谬论。鼓舞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大刀进行曲》大大鼓舞了二十九军和全国军队广大官兵抗战的决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新阶段》的讲话，指出我

方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新阶段歌》集中描绘了敌我相持阶段的特点："我们的意志已锻炼成金刚，四万万同胞结成坚固城墙……快克服困难，快渡过难关，抗战的反攻阶段就在眼前。"日寇对冀中根据地"扫荡"时，唱出了："日本鬼子调大兵，想要把冀中一扫平。偏偏他遇见了子弟兵，把鬼子打得可不轻……"

在日军重点进攻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包围封锁解放区。中国共产党贯彻"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个时期出现的《起来反内战》、《抗战到底没有和》、《茂林惨案》、《骂何应钦》等歌曲，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残酷杀害抗日军民的罪恶行径。

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根据地便出现了一批动员反攻的歌曲。如《前进！解放区的军民》、《反攻进行曲》、《我们是反攻的主力》等。反攻阶段到来，抗日军民士气高昂，捷报频传，《我们的旗帜到处飘》、《抗日战争大胜利》等歌曲到处传唱，表达了抗日军民的喜悦之情。

抗战歌曲演唱的传播，对发动群众，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抗战歌曲像"长了翅膀的雄鹰"到处飞翔，传遍广大城乡。从太行山麓到渤海之滨，从海南椰林到东北雪原，从田间地头到院落炕头，到处激荡着抗战的歌声，成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强大精神武器。它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发挥了其他文艺形式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群众性的文艺

活动和军事、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开展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抗战歌曲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以其充满爱国激情的民族性，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历史性彪炳于抗战文艺史册。可以说“抗战歌曲”在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主要特点是：

其一，立竿见影，唱做结合。唱了《献公粮》，就回家背粮献给抗日民主政府；唱了《破击战》，就扛起锹镐去破路。广大青年唱了有人认为不能登上音乐舞台的《十杯茶》，就踏着“二十少年去当兵……”的节拍参军参战。广大妇女唱了《妈妈娘好糊涂》就立即“剪发”、“放足”，摘下“耳坠”，冲出家庭走入学校，参加识字班等，对战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歌曲成了人们抗战行动的指南。

其二，创作的群众性和实践性。由于抗战时期，宣传、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需要的急迫性，大大促进了抗战歌曲创作队伍的形成。以专业音乐工作者为主和业余音乐工作者民间歌曲爱好者相结合的创作演唱队伍应运而生。写词、谱曲、创作、教歌、唱歌浑然一体，有些歌曲是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抗战歌曲创作者都是抗日战争的实际参加者。从军队到地方，从战火纷纷的战场到敌后紧张的战时生活，都有广大音乐工作者的足迹。他们通过亲身体会、耳闻目睹，吸吮了战时生活和时代气息，升华为浓郁的抗战之情。可以说，抗战歌曲是人们当时生活的结晶和感情的凝聚，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推动了实践。

其三，题材多样化。歌词内容随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抗战有什么任务，就有什么歌。有揭露也有控诉，有歌颂也有讽刺，有悲歌也有欢唱，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既有益于配合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又有利于丰富当时的群众文化生活。

其四，语言大众化。经过艺术加工的方言土语和生活用语，成

了抗战歌曲的主要词汇，鲜明具体，形象生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唱上一两遍就难以忘怀。这些歌曲音域不宽，咏唱难度不大，无伴奏亦可，较为适合紧张的战时环境和抗日军民的文艺水平。从曲谱来看，既有震聋发聩的创作，也有借用民歌古曲填新词的抗战之歌。以今天的审美观点来看，有些新词借用旧谱，词曲难免显得不大和谐，这也是战争年代人们对精神食粮饥不择食的自然现象，是不应以今天的尺度苛求于前人的。

其五，鲜明的战斗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大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整个生活都以抗日为中心运转，歌曲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强烈的战斗性，听歌唱歌犹如置身战场与敌拼搏。那慷慨悲壮、激越昂扬的歌声，是英雄儿女真实感情的流露。今天唱起《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等，仍然给人们以“耳边犹闻战马鸣”的感觉。忆唱者傅青先同志，在忆唱中常常是热泪满面。忆唱者王智同志说“每次唱抗战歌曲就浑身长劲，好像年轻了十年”。已出版的《抗战歌曲选》的责编同志，边审稿边吟唱边流泪，可以说是用泪水完成审稿的。抗战歌曲感人之深可想而知。

总之，抗战歌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而且是革命先辈战时生活的日志，是抗战历史的记录，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是伟大时代革命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值得世世代代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三）

本书收入的抗战歌曲有些是选自公开出版的歌曲集，还有很多是亲自参加过那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老同志收集、回忆和保存的抗战歌曲，这是革命先辈为我们留下的一笔无价之宝。在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过程中，不少同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全心全意投入这项工作。直到本稿结束前河北省唐山市 70 多岁的市委

财贸部原部长康素杰同志(女)还昼夜不停地忆唱了34首抗战歌曲,把录音带邮寄主编,表现了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这部《抗日战争歌曲集成》,基本上按歌曲创作和流行的地域及时间进行编辑,共分七卷。为了便于理解抗战歌曲的内容、意义,各卷卷首都写了一篇有关的历史概述,并对部分歌曲的背景、内容和作者作了简要的注释。

重温抗战歌曲,有利于激励人民振兴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历史永远是教科书。抗战歌曲就是一部以特殊形式谱写的抗日斗争史,是对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不可缺少的教材。歌之咏之,必将有效地激发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雄心壮志。

重温抗战歌曲,有益于更加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自立,奋发进取的爱国主义旋律,在抗战歌曲中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正是这一首首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战歌,曾经激励着一代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这种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重温抗战歌曲,有助于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回首历史尘烟,重温峥嵘岁月,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新世纪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完全相信,只要各级领导重视,科学安排,每年演唱几次或平时哼唱抗战歌曲并巧妙运用,这部歌曲集成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抗战胜利半

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发展中日友好的同时，日本国内仍有极少数右翼分子对这段血淋淋的侵华罪恶史，明目张胆采取“不认账”的态度，甚至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并借修改教科书之机公然歪曲历史真相。这一首首渗透着中国人民血和泪的抗战歌曲，既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行的铁证，也是对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有力回击。历史在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分裂就要挨打，没有中国人的志气就要挨打。”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同5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作风，那么一种干劲，牢记历史音符，向所有阴暗角落刮来的阴风进行不懈的斗争。踏着新世纪的节拍，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努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抗日战争歌曲集成》编委会

2002年12月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概述[①]

武杰　乔树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早开辟抗日战场，历尽艰辛，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达14年之久，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滞迟了日本的侵略计划，钳制和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北人民坚持抗战14年，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东北人民独撑对日抗战6年之久。

在东北，首先兴起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绝对不准抵抗，近20万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短短数日内，日军占领了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省大片国土。在民族危急之际，中国共产党立即提出了在东北发动民众武装反日，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支持下，东北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及警察部队的部分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进行武装抗日斗争，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辽宁省，九一八事变时，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率部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邓铁

①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东北沦陷十四史研究》第2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卷。

梅在凤城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各地民众相继建立义勇军，到1932年5月，辽宁省义勇军迅速发展达25万人，划分为五个军区，各路义勇军频频出击，破铁路，炸桥梁，攻克锦西、绥中、兴城、通辽、抚顺等10余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并袭击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在吉林省，东北军团长冯占海，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营长王德林等先后率部抗日，得到各地民众热烈响应，到1932年4月，李杜等建立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建立的吉林救国军等部发展到15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同日伪军交战数百次，攻占城镇30余个，控制了吉东13县广大地区。在黑龙江省，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江桥一带与日伪军奋战月余，而后组织义勇军，到1932年5月，义勇军发展到8万人，在海伦成立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海满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率部3万余人抗日，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1932年夏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发展到约50万人，在东北四省172县中的102县内进行战斗，攻占了40余座县城，多次袭击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殖民政治。据日伪官方的统计，自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止，日军及伪满洲国军伤亡总数6541人，平均每月“讨伐”义勇军150余次，阵亡73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威胁，1932年4月起，先后增派第8、第10师团主力，第6、第14师团，第20师团司令部及混成旅团，混成第38旅团，骑兵第1、第4旅团加强关东军，连同原有第2师团，共6万余兵力，于冬季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大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经顽强作战，在局部地区取得了一些战果，但由于孤立无援，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至1933年春大部败散，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开辟游击区的指示，1932年起创建了

十几支反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及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这两部分武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

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自1932年开始，杨靖宇、赵尚志、童长荣、夏云杰等先后创建了巴彦、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反日游击队，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进行改造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等也建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抗日救国游击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反日游击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游击区，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初，抗日游击活动遍及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各地30余县，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5月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反日游击队基础上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相继建立了6个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政治部主任胡仁；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张寿(李兆麟)。东北人民革命军经过两年多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讨伐”，包括1934年4月的春季大“讨伐”，特别是同年10月日军6个师团联合伪满洲国军3万余人以通化、哈东、延边、绥宁为重点的秋季大讨伐，抗日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到40余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精神，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原6个军依序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后来又相继组建了第七至第十一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政治部主任郑鲁岩；第八军，军长谢文东，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第九军，军长李华堂，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第十军，军长汪亚臣，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3万余

人，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4月，日军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从1936年至1939年以三年时间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妄图予以全歼。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成立后，抗日联军先后组成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第一路军于1936年7月组成，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副总指挥王德泰、魏拯民，辖第一、第二军，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第二路军于1938年初组成，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及王荫武部救世军、姚振山部义勇军，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第三路军，于1939年5月组成，总指挥张寿，政委冯仲云，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隶属中共北满省委领导。

日伪军把抗日联军第一路军视为“满洲治安之癌”，1936年秋，集中主力，围攻通化、柳河、集安、抚松、辑江、磐石等游击区。同时，以第9师团在松花江两岸“讨伐”吉东、北满地区的抗联各军。抗日联军在反“讨伐”作战中密切配合，更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奋战，同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讨伐”，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日本政府为实现控制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不得不迅速加强关东军，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增至四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三个骑兵旅团和五个相当于旅团的独立守备队，加上伪满洲国军十个旅，总兵力约达30万人。

第二阶段：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前，东北人民配合全国抗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对日游击战争。

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配合全国抗战，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日伪军，掀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热潮。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在南满各地与日伪作战，半年间，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曾攻克抚松、辉南、宽甸、金川等十几座城镇，消灭日伪军2.5万余人。战斗在